

很多人将如今的高考比喻为古代的科举考试,其实,“高考”和“科考”可谓“差之一字,谬以千里”,完全不可“同日而语”。

中国古代年龄最大考生 102岁参加科举

古代年龄最大的“考生”

在中国古代,参加科举考试往往被认为是进入仕途的惟一出路,古代学子寒窗苦读,目的大多是“奋志科名”,因而“科考”的考场上有很多“屡不中屡考”的考生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吴敬梓笔下的范进。“范进中举”是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中的故事,范进考了20多回,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,所以得知喜讯后高兴得疯了。虽然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小说,但所反映的情况并非虚构。在科举史上,像范进这样54岁还参加考试的并不稀奇。

明末人谈迁在《枣林杂俎·圣集·科牍》中,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。其中提到的刘珠、董又莘两位进士,均为高龄考生。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,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“湖北老乡”,关系很好。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,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,考中进士。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相比,刘珠不算大了,董又莘到70岁“古稀之年”才考中进士,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。好在董又莘长寿,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,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。

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,所以“父子同场”的现象很常见。清代史学家王西庄(王鸣盛)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。但王西庄32岁时,以“一甲第二人”(榜眼)考中乾隆十九年进士,做了大官。而王西庄的父亲还是没能通过乡试,后来到挂拐棍时仍参加考试。据《清稗类钞·考试类》“王西庄随父应岁科考”条所述,当时有一与王西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,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?老秀才严肃地说:“大丈夫奋志科名。”

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“考生”

年龄最高纪录的,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。据清代陈康祺在《郎潜纪闻二笔》中记载,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(公元1699年)乡试时已102岁,已有重孙子了。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“百岁观场”四个大字,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,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,105岁时也考不中,到108岁时才有好运。

令人感慨的是,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。乾隆六十年(公元1795年)会试中,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,其中80岁、90岁以上,并考完了三场的考生有92人。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感动,“俱加赏赐”。在乾隆当皇帝期间,曾多次赐予老年考生功名,如乾隆三十五年(公元1770年)江西乡试中,兴安县99岁考生李炜,三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,乾隆听说后特“赏给举人”。

古代也有“复读”吗?

现在高考考点很多,可以就近参加考试,在古代,科举的第一轮考试“乡试”,一个省或大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,是全省统一考试。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,考场设在京城,考生要跋山涉水“进京赶考”。所以,好多考生(举子)在京城考完试后,“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”,闭门苦读,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。这种现象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尤其明显。

在唐代,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,又称“过夏”,因为要在京城过夏天了,就在考地复习。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,又称“夏课”。用唐人李肇《唐国史补》的说法是,“退而肄业,谓之过夏;执业以出,谓之夏课。”

在唐代,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

风特别盛行。夏课主要的作业是“写论文”,进行诗文的创作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开家,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。古代交通不便,家庭条件好的考生有舟车乘坐,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,路途少的耗时月余,多者数月甚至半年。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行,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,呆在京城,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,又有复习时间。

古代科举考试中的“行卷”

在唐代,考生考完不离京,除了“夏课”复习的需要外,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,这就是“行卷”。

所谓“行卷”就是考生拉关系,走后门。具体是这样操作的: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,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,以求得这些“贵人”、“名人”的赏识,向主考官推荐自己。“行卷”往往能增加考官对考生的“印象分”,直接提高中考率。

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(公元800年)考中进士,就得益于“行卷”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,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,没一点名气,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,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、诗人顾况。顾况听罢笑称,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,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,即所谓“长安百物贵,居大不易”一说。当读到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中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一句时,顾况当即改口:“有句如此,居天下有甚难!”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青睐。

“行卷”其实是一种作弊行为,乃科举腐败,但在唐朝很流行,一些考得不好或怀才不遇的学子,只要有可能会都找门路“行卷”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白居易曾参加异地“高考”



其实,异地高考并非当今的产物,幅员辽阔的中国在古代就有了“异地高考”。

从隋唐起,以科举制取代察举制,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。然而,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,首都即京兆府(长安)录取的名额大大高于其他地区。在唐代,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;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,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,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,甚至有时超过百人。这在柳宗元的《送辛生下第序略》可见:“京兆尹岁贡秀才,常与百郡相抗。”

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:“东南州进士取解者,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,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,是百人取一人。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,而所解至十余人,是十人取一人。”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:1,录取率高的州10:1。比例之悬殊,令人惊诧。

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,京城一直扮演着“低分洼地”的角色。以嘉祐五年(1060年)为例,首都开封府的解额(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“解额”)是266人,而陕西只有123人,广东只有84人;而且,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。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,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。

在清代,顺天府(北京)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,同治元年(1862年)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,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,广东省为102人。京城的录取名额,超过任何一个大省,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。

正因为如此,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,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,以增加录取的机会。但是,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唐代,法律规定,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,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。因此,异地考试只能“暗箱操作”,不被他人所知道。如中唐著名乐天派诗人白居易就是异地考试的一员。白居易的祖籍在陕西,后来迁到陕西省渭南下邦镇。按道理,白居易参加考试应在渭南,但却在安徽宣城参加考试。为何白居易要冒犯法的风险?因为安徽的录取率要比陕西高。

在古代,也有违规异地高考不用受处罚者,用现在眼光来看,大概可以算作“开后门”。唐代大诗人王维籍贯在蒲州(今山西省永济市),而他却在录取率最高的京兆府参加考试。原因是他具有弹琵琶才艺,在一次偶然展现才艺的时候,令某公主陶醉。公主出面疏通关系,终于使王维能够如愿以偿“光明正大”地参加异地考试。

(据中新网)

古代科考中的“照顾分”

古代考生在考完试后,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,是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,相当于现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。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取、破格录取的机制,存在“加分”、“特招”这类现象。以宋朝为例,考中者中便有“正奏名”、“特奏名”的区别,有点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“正取生”与“特招生”。

所谓“特奏名”,是宋代特殊的进士录取机制,即解试中榜而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,在参加若干轮的考试,且到一定年龄后,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特别登记造册,上报朝廷,直接参加最后一轮考试,评出等第,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。

在宋代,科举考试分为解试、省试、殿试(皇帝主持)三级。所谓“解试”,即唐代的州试,明清时的乡试,为古代科举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。唐宋时期通过解试的考生称“贡士”,

明清叫“举人”;通过最后一次殿试的考生称作“进士”,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“状元”。

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、举人,也是很难的。当年,陈独秀就没通过乡试。陈独秀首次参加当地官府组织的“童子试”,虽然顺利地考取到了“秀才”,但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山。

因为乡试很难考过,所以各个朝代或多或少对这部分参考决心很大、“屡考屡不中”的考生有所照顾。其中,宋代的照顾办法“特奏名”最受考生拥护。

据《宋史·选举志一》记载,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开宝三年(公元970年),“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,得一百六人,赐本科出身”。也就是说,连续参加15次进士考试,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“特奏名”的机会。实际上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,并不容易。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,到获得特赐进

士时,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,因此时人称这种“特奏名”为“老榜”。

因为不是正取,年纪又大,社会上对“老榜生”的评价较低。宋代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有这么一段记载:福建人徐通通过“特奏名”,获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进士,参加完在御花园琼林苑里举办的“闻喜宴”后,大家骑马挂花回住处。经过“红灯区”时,别人的红花都让妓女抢走了,惟独徐通的花没人要。徐通为此伤心,在客栈房间的墙壁上题诗自嘲:“白马青衫老得官,琼林宴罢酒肠宽。平康过尽无人问,留得官花醒后看。”

除了“特奏名”这种特殊照顾的情况,在古代科举考试当然不会少了花钱“买分数”、“买录取通知书”等腐败现象。如在明代,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“例监”,便是花钱搞到入学指标的学生。(据凤凰网)